**南 开 大 学**

**本 科 生 学 年 论 文**

**中文题目：**回到埃申迈耶尔

——谢林1801年的“同一性哲学”

**外文题目：**Return to Eschenmayer

——Schelling’s Philosophy of Identity of 1801

|  |  |
| --- | --- |
| **学 号：** |  |
| **姓 名：** |  |
| **年 级：** |  |
| **专 业：** |  |
| **系 别：** |  |
| **学 院：** | 哲学院 |
| **指导教师：** |  |
| **完成日期：** | 2020年4月26日 |

# 摘 要

本文意图回溯谢林与埃申迈耶尔1797-1801年的自然哲学争论，为谢林“同一性哲学”之发生的“自然哲学解释”声援。作为自然哲学较长轨迹的顶点，谢林在1801年的立场体现为“同一性”的“无差别模式”，这一模式受到了同时代黑格尔、费希特、埃申迈耶尔甚至是谢林本人的挑战，但最终谢林还是回到了这一立场，并且由此作为晚期哲学方案的前奏。本文的全部论证最终将试图表明：谢林1801年的“同一性哲学”作为“纯粹的理性科学”，聚集了（1）近代形而上学最高诉求的失败的**预示**：作为基础的理性无法完全把握现实；（2）德国唯心论最高诉求的失败的**预示**：超越性与全体性的难以兼容。因此，正是“绝对的黑夜”——“同一性哲学”失败之处，谢林随后将其转化成“知识的白昼”。

关键词：谢林；埃申迈耶尔；同一性哲学；自然哲学解释；无差别模式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trace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Schelling and Eschenmayer from 1797 to 1801 about philosophy of nature and to give voice to the “nature-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helling’s philosophy of identity. As the culmination of a longer trajectory of philosophy of nature, Schelling's position in 1801 was embodied in the “indifference model” of identity, a model that was challenged by contemporaries such as Hegel, Fichte, Eschenmayer and even Schelling himself, but to which Schelling eventually returned, and thus served as a prelude to a late philosophical scheme. The entire argument of this paper will ultimately attempt to show that Schelling's philosophy of identity as a “purely rational science” gathers (1) the foreshadowing of the failure of the highest claim of modern metaphysics: the inability of reason as a foundation to fully grasp reality, and (2) the foreshadowing of the failure of the highest claim of German idealism: the incompatibility of transcendence and totality. Thus, it is the “absolute night”, where the philosophy of identity fails, that Schelling subsequently turns into the “day of cognition”.

**Keywords:** Schelling; Eschenmayer; Philosophy of identity; Nature-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Indifference Model

目 录

[摘 要 2](#_Toc38199607)

[Abstract 3](#_Toc38199608)

[引 言 5](#_Toc38199609)

[一、曙光（1797-1801）：“同一性”的发生之路 10](#_Toc38199610)

[（一）物质的建构：质与量 10](#_Toc38199611)

[（二）体系优先性：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 15](#_Toc38199616)

[（三）方法论：超越式抽象与沉浸式抽象 18](#_Toc38199617)

[二、白昼（1801）：“同一性”的拨云见日 22](#_Toc38199618)

[（一）量的差异、磁力线与Potenz 23](#_Toc38199619)

[（二）“同一性”的“无差别模式” 26](#_Toc38199620)

[三、暗流！（1801）：“同一性”的时代争鸣 27](#_Toc38199621)

[（一）黑格尔的回应 27](#_Toc38199622)

[（二）费希特的回应 29](#_Toc38199623)

[（三）埃申迈耶尔的回应 30](#_Toc38199624)

[四、黑夜？（1801-）：“同一性”的拨乱反正 31](#_Toc38199625)

[（一）“同一性”“无差别模式”的延续 31](#_Toc38199626)

[（二）“同一性”的极致和终结 32](#_Toc38199627)

[尾 声 35](#_Toc38199628)

[参考文献 36](#_Toc38199629)

# 引 言[[1]](#footnote-1)

## （一）本文的三个目的

1801年，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新篇章开启：5月出版的《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2]](#footnote-2)通常被认为是谢林“同一性哲学”的开端。多年后，在与埃申迈耶尔（Eshcenmayer）的信件中，谢林回顾性地将这一开端描述为“1801年，当哲学上的光亮在我身上迸发”的顿悟时刻。[[3]](#footnote-3)

但开端不等于起源，修饰性的“顿悟”也不代表着谢林思想的实际断裂。一方面，在《阐述》序言中，谢林写道：“没有人会认为我改变了我的哲学体系。因为在此第一次出现的体系，以完全相同的特征形式，贯穿在我早期的阐述中，作为我先验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启明星……”（SW 4,107）[[4]](#footnote-4)另一方面，谢林在随后几行又表达了不同观点：“我认为它们每一个（即早期或者局限在自然哲学，或者局限在先验哲学的阐述）只不过是对该体系的片面陈述……通过现在的论述，我把自己置于它们之间的无差别点上。”（SW 4,108）[[5]](#footnote-5)

因此，瓦特（M. G. Vater）指出，“如果不是自相矛盾，序言有双重任务：使读者相信同一性哲学并非是新鲜事物（not new）；使读者相信同一性哲学是新鲜事物（is new）。”[[6]](#footnote-6)

但这种创新性和连续性之间的含糊不清，导致了一个围绕谢林1801年哲学立场的问题，即《阐述》是否标志着谢林哲学轨迹的断裂点。

布莱克曼（A. Braekman）对该问题的兴趣是有代表性的：

“谢林哲学发展中最引人入胜的一幕，是从1800年《先验唯心论体系》到1801年《阐述》的转变，这是同一性哲学的起点……因此如下问题不可避免产生：上述转变过程发生了什么，以及最重要的，是什么促使了这种转变？换句话说，是什么导致了绝对唯心论的形成？”[[7]](#footnote-7)

围绕谢林“同一性哲学”之发生的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平行解释”（parallelism interpretation）和“自然哲学解释”（nature-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前者坚持认为，《阐述》基本上重复了《自然哲学体系初稿》[[8]](#footnote-8)（1799）和《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中提出的哲学科学模式，其中先验哲学和自然哲学被理解为平行的科学，其基础是“同一性哲学”更基本的形而上学论述；后者则坚持认为，在《先验唯心论体系》和《阐述》之间发表在《思辨物理学杂志》的两篇文章，《动态过程的普遍演绎》和《论自然哲学的真正概念》[[9]](#footnote-9)，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发生了变化，自然哲学被赋予了优先的地位。[[10]](#footnote-10)

传统上，学术界（尤其是英语学术界）几乎普遍地遵循“平行解释”，强调谢林著作的连续性。例如，纳萨尔（D. Nassar）认为，正是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谢林试图建立自然的生产力与精神的生产力的同一性，这也成为他“同一性哲学”的基础思想，因此《先验唯心论体系》应被视作“同一性哲学”的转折点，但转折并不意味着断裂或者破裂。[[11]](#footnote-11)

这种论调的证据充分体现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其中谢林清楚地表明，“自然与理智的平行对应关系……要完整地描述它，单靠先验哲学或者单靠自然哲学都是不可能的”（SW 3,331）[[12]](#footnote-12)，“这两门基本科学在原则上和方向上都彼此对立，而又相互需求和相互补充。”（SW 3,340）[[13]](#footnote-13)

这的确是令人信服的解释。但这种解读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先验唯心论体系》和《阐述》之间，发表在《思辨物理学杂志》的两篇文章的意义。例如《演绎》的最后，谢林总结道，“我们已经从完全相反的方向达到了这一点——从自然到我们和从我们自身到自然，但崇尚知识高于一切的人，其真正的方向是自然界本身的道路。”（SW 4,78）随后在《概念》中，谢林更是毫不掩饰地赋予了自然哲学体系优先性：“因为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被认为是对立但同样可能的哲学取向，许多人问何者具有优先地位？——毫无疑问，自然哲学，因为它让唯心主义的立场本身首先出现，从而为它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纯粹的理论基础。”（SW 4,92）[[14]](#footnote-14)

因此，对“同一性哲学”之发生的“自然哲学解释”从上述文本出发，拒绝了先验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平行性，认为谢林的“同一性哲学”是从自然哲学的优先地位中发展出来的。

在此，分歧的关键在于：是《先验唯心论体系》，还是谢林为《思辨物理学》撰写的两篇文章，应该被视为谢林进一步发展的规范？

后一种选择在英语学界逐渐获得了支持。无论是格兰特（I. H. Grant）直截了当宣称“谢林的哲学，包括同一性哲学，是贯穿始终的自然哲学” [[15]](#footnote-15)，还是拜赛尔（F. C. Beiser）主张，作为谢林放弃早期的平行主义的结晶，《阐述》是“自然哲学的最后胜利”。[[16]](#footnote-16)[[17]](#footnote-17)翟灿通过对德语学界的研究综述，描绘的谢林自然哲学的发展线索，同样支持这样一种解释。[[18]](#footnote-18)

本文的**第一个目的**即在于此。通过回到该时期一个关键人物埃申迈耶尔[[19]](#footnote-19)——《概念》正是对其批判的回应，梳理了1797-1801年谢林与埃申迈耶尔争论的核心内容，试图为“同一性哲学”之发生的“自然哲学解释”声援，当然，我们也会考虑可能的“平行解释”的**反驳。**

在哲学史上，埃申迈耶尔一直得不到重视。然而，在1797-1812这十五年间，他作为谢林“最具洞察力和挑衅性的批评者之一”[[20]](#footnote-20)，与谢林发生了三次著名的争论：

（1）1801：埃申迈耶尔对谢林早期自然哲学的批判性回应《自发性=世界灵魂》发表在《思辨物理学杂志》，谢林以《概念》作为回应，在回应中，谢林预告了《阐述》将在下一期发表；

（2）1803-4：关于哲学与信仰各自对于同一中差异的出现的解释能力，埃申迈耶尔对谢林的误解产生的《哲学过渡到非哲学》，以及谢林的回应，《哲学与宗教》[[21]](#footnote-21)；

（3）1809：在谢林出版《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后，两人就人性在自然中的地位、理性的限度以及如何正确地构想上帝的人格等问题展开一系列的争论。

仅从时间节点上看，我们也不得不同意马尔凯（J.-F. Marquet）的描述，埃申迈耶尔的确“在谢林思想的每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22]](#footnote-22)

因此，本文的**第二个目的**，在于通过回到谢林-埃申迈耶尔的早期争论，为谢林1801年的“同一性哲学”的思想资源注入一些新的活力。[[23]](#footnote-23)

最后，谢林的1801年“同一性哲学”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一方面，在与黑格尔、费希特、埃申迈耶尔后续的争论中，谢林的立场在这一阶段多有偏转，另一方面，黑格尔后续对之不遗余力的讽刺和批判[[24]](#footnote-24)。因此，本文的**第三个目的**，即考察谢林1801年“同一性哲学”的得失。

## （二）本文各章节简介及论证目的

本文第一部分，将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即（1）物质的构建；（2）体系优先性；（3）方法论，展开谢林与埃申迈耶尔的自然哲学争论（1797-1801）。

本文第二部分，将围绕上述争论的最终结晶，即作为谢林“同一性哲学”开端的《阐述》的核心概念，即量的差异、磁力线与Potenz，描述“同一性”的“无差别模式”。

本文第三部分，将围绕黑格尔、费希特以及埃申迈耶尔对于谢林《阐述》的回应，展开“同一性”的时代争鸣。

本文第四部分，将围绕上述回应，以及谢林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对于“同一性”的误解作出澄清和说明，并对谢林1801年的哲学立场作出评述。

# 一、曙光（1797-1801）： “同一性”的发生之路

## （一）物质的建构：质与量

### **1.1797**

无论是谢林还是埃申迈耶尔，都受到了康德《自然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影响，尤其是“动力学”对于物质的建构。在康德看来，物质是由吸引力和排斥力这两种不可还原的基本力构成的，并且在区分了基于先天数学推理的本真科学和基于经验发现的非本真的科学之后，主张物质可感知的化学性质不能作数学的应用。[[25]](#footnote-25)

埃申迈耶尔对此提出了挑战，在《自然-形而上学的原理在化学和医学领域的应用》[[26]](#footnote-26)中，埃申迈耶尔将康德的观点激进化：自然界的一切，包括可感知的化学性质，都可以还原为排斥力和吸引力之间的比例关系，所有质的差异都是自然的两种基本力衍生出来的，因而数学可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

在此基础上，埃申迈耶尔提出了一个Potenz[[27]](#footnote-27)序列，即无限的量之间相互关联的指数序列，以此来描述激进化的康德动力学。埃申迈耶尔首先将两种基本力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两种趋向无限的平衡：一方面，吸引力是“使物质无限返回某一点的趋向”（1/∞），另一方面，排斥力是“将物质无限向外扩展的趋向”（∞）。这里的独特之处在于无限的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有限的概念（即与每一个有限对象相关的**质**）：前者与其说是已完成的无限，不如说是一种无限的趋向，后者则应被定义为两个对立的无限倾向（即排斥力∞和吸引力1/∞）的产物，其间的一系列无限的项描述了有限的可能形式，也就是说，有限本身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埃申迈耶尔给出了如下的公式（其中，A表示吸引力，B表示排斥力）：

A.B+n，…A.B+3，A.B+2，A.B+1，M0 ，A.B−1，A.B−2，A.B−3,…，A.B−n

在序列的中心，M0起着重要作用，谢林将在《概念》中对哲学方法论的讨论中抓住这点。根据埃申迈耶尔的观点，如果这个序列中的每一项都处于“相对平衡”，那么M0则代表了“绝对平衡”点，其本身不具有规定性的质，意味着“无差别”。只有当两个基本力之间存在相对差异时，也就是说，只有当两个力中的任何一个增加或减少时，物质的质，才会出现。

通过这些运用，埃申迈耶尔数学解释模式的成就在于，它将“质”回归到“量”：物质之间的差异，不是不可化约的质的差异，而只是程度、数量的差异。这对于谢林的同一哲学至关重要。

尽管谢林在《一种自然哲学的理念》[[28]](#footnote-28)中称赞了埃申迈耶尔试图将康德动力学应用到一切领域的努力，但谢林比埃申迈耶尔更接近康德的保守立场，尤其是在自然的基本力与化学现象之间。谢林认为，不能通过先天推理来认识化学现象，因为它们是需要感性地直观的现象。与之相反，基本力不是可经验的现象对象，而是客观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

然而，与康德不同的是，谢林对力的推导始于直观的结构[[29]](#footnote-29)。谢林认为，直观是精神“积极的”、“向外的无限制活动”和限制第一种活动的精神与自身的“消极的”关系的统一。一旦精神试图理解物质，它就把自己的原始的和对立的活动作为排斥力和吸引力在自然中发挥作用：积极的、无限的精神活动向外扩展为物质的排斥力；消极的、自我导向的精神活动成为吸引力。

当然，在1797年，无论谢林还是埃申迈耶尔，都是遵循着康德动力学的基本精神（吸引力和排斥力的二元论），进行物质质的建构。

### **2.1799**

谢林在《初稿》中没有提到埃申迈耶尔，但他在同年的教学文稿[[30]](#footnote-30)中补充道：

“质原初就是绝对不可建构的，而且必须如此，因为它是所有建构的极限。……由于这个原因，以前所有对质的建构的尝试都不能导致任何真实的东西。……事实上，康德并没有真正冒险地从他的两种基本力出发来建构物质的具体多样性。一些希望应用他的动力学原理的人走得更远。我在这里只说出埃申迈耶尔……” [[31]](#footnote-31)（SW 3,24）

因此，谢林在《初稿》对于自然的建构背离了康德-埃申迈耶尔动力学传统。这种对质的可构造性的背离有多种原因，与我们主题相关的主要是以下两方面：

**（1）数学原则和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

谢林认为，动力学依赖两种基本力解释物质世界的多样性，这最终只是前康德式的机械哲学以其传统的数学工具，被移植到了流行的动力学语言中。

在这一时期，谢林理解数学在自然哲学中的基础作用与埃申迈耶尔相去甚远。对于埃申迈耶尔来说，数学提供了理解物质世界所需的基本原理，对于谢林来说，数学不是基本的，而是从自然哲学中衍生出来的。换句话说，谢林指责埃申迈耶尔未能尊重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自然的自主性和自足性[[32]](#footnote-32)，根据这一原则，对自然的解释必须使用自然本身的范畴。

**（2）产物和生产力**

谢林进一步认为，埃申迈耶尔未能辨别数学的衍生性是后康德动力学建构的另一个失败的征兆：它倾向于关注自然的产物（product），而不是自然本质上的生产力（productivity）。也就是说，动力学自然哲学家对数学的过度使用说明了其未能获得自然的原始生产力[[33]](#footnote-33)，只有通过这种生产力，自然的产物[[34]](#footnote-34)才在哲学上是可理解的。根据《初稿》，动力学建构只能证明，由于基本力的不同比例，产物在量上存在差异；但它永远无法解释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的，换言之，康德-埃申迈耶尔未能考虑自然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体现，就在于没有解释基本力的起源。谢林认为，动力学所依赖的两种基本力，只是自然中更基本过程的衍生物。因此，谢林的自然哲学要比康德-埃申迈耶尔彻底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他声称“康德动力学的起点，是我们理论的终点”。[[35]](#footnote-35)（SW 3,264）

因此，谢林放弃了康德-埃申迈耶尔的动力学物质建构，短暂地转向了动态原子主义。根据谢林的观点，虽然我们不应该回到自然界是由绝对不可入的微粒组成的观点，但我们可以借助动态原子来解释我们在经验中感受到的质。谢林给这些动态原子贴上“行为体”（actants）的标签，并把它们定义为自然界中的“原初的质”[[36]](#footnote-36)（SW 3,27）——这些质不能简化为物质基本力之间的某种更基本的关系，但它们本身作为生产力的逐渐迟滞所产生的抑制点却是现实中最基本的元素。

### **3.1801**

正是由于谢林对于物质建构的动力学理论的背离和对于动态原子主义的兴趣，埃申迈耶尔在《自发性=世界灵魂》中展开了批判，并为自己诉诸动力学建构具体物质的质辩护。

批判的细节我们并不想具体展开，因为谢林在《概念》的回应中，明确说明，他和埃申迈耶尔的分歧“并不在此”[[37]](#footnote-37)（即对于动态原子主义的短暂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埃申迈耶尔认为，谢林在《初稿》中大部分内容与他自己的力的比例的Potenz序列相吻合。也就是说，谢林把行为体看做是生产力的逐渐迟滞所产生的抑制点的概念，对埃申迈耶尔来说，是在一个Potenz序列中描绘质的另一种方式。从这个角度看，谢林并不像他认为的那样远离动力学立场，特别是考虑到《初稿》对排斥力和吸引力和对自然的生产和抑制倾向的论述的相似性。[[38]](#footnote-38)

因此，概括地说，埃申迈耶尔认为，他和谢林都同意在自然中有两个因素——对1799年的谢林来说，是生产力和生产力的限制；对埃申迈耶尔来说，是排斥力和吸引力——产生了由一系列的简单的、非物质性的、不可还原的点组成的序列，正是这些点揭示了自然中明显的质的多样性。对于谢林来说，这一序列是行为体的序列；对于埃申迈耶尔来说，这一序列是基本力的比例序列。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埃申迈耶尔未能充分考虑的差异。对于谢林来说，生产力及其限制必须从一个自我分叉的单一原则产生。虽然直到1801年5月的《阐述》中，谢林才完全表达出二重性源于纯粹的同一性的观点，但他与埃申迈耶尔的二元论的不同之处，在《初稿》中已经有所暗示，例如谢林写道，“这种对立面必须被假定来自于普遍的同一性。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发现自己被驱使到一个不再以异质性为前提的目标，而是其本身（即同一性）产生了异质性。”[[39]](#footnote-39)（SW 3,250-1）

1801年1月，谢林在《思辨物理学杂志》发表了《概念》，以回应埃申迈耶尔的批评。回应的细节我们也不必完全展开，重要的是，谢林从《初稿》中一些尖锐的立场中部分退缩了：对于物质质的定量解释，尤其是取而代之的动态原子主义。当然，这一退缩在1800年的《演绎》中已经有所体现，因此谢林声称，他和埃申迈耶尔的自然哲学的区别并不在此。尽管如此，谢林仍打算将他新修订的自然哲学与埃申迈耶尔的动力学拉开实质性的距离：

“我与埃申迈耶尔观点之间的区别……在于，在基本力彼此的比例上，他宣称，仅仅是一种量的差异，可以由一种或另一种力的相对过剩或不足来决定。……此外，通过这些不同的量的比例，以及通过它们所表示的公式，他相信他已经得出了物质的所有具体差异……”[[40]](#footnote-40)

尽管谢林承认《自发性=世界灵魂》中的一些批判是成功的，但他仍然拒绝了埃申迈耶尔对质的构建。但是，谢林在此拒绝的只是基于埃申迈耶尔动力学的定量解释模式，而不是对定量解释模式本身的拒绝：事实上，4个月之后的《阐述》中，谢林将量的差异（quantitative difference）作为其解释差异的核心概念。

此外，谢林和埃申迈耶尔的另一个关键性的区别是，通过废止动态原子主义的“行为体”概念，谢林的Potenz序列彻底呈现了一元论的底色：埃申迈耶尔的序列是由两个因素（动力学的吸引力和排斥力）构成的，而谢林的序列是由一个因素单独产生的，这就是主-客体或者绝对自身的生产力。这种从二元论到一元论的这种转变是谢林自然哲学的长期趋势：《初稿》中，谢林只是假设自然的各种二元论的基础是生产力与自身的同一性；《演绎》宣称，所有对立的活动都统一于一个更基本的同一性之中；而在《概念》中，谢林认为，自然界从无机到有机的一系列阶段性的发展是由主-客体的生产力单独推动的，而不是两种基本力的相互作用。尽管《概念》中的主-客体似乎也是由两个部分（主体和客体）组成，但谢林明确指出，“主体”和“客体”是由它们的原初同一性派生出来的，这一论点成为《阐述》形而上学的根本要素。

当谢林在1803年将《理念》修订成第二版时，他对物质质的自然哲学建构的态度已经稳定下来：

“在真正的自然哲学中，所有这些被错误的物理学所固定下来并使之永恒存在于所谓的基本实体中的物质的质的差异都终结了：物质本质上是一个整体，是纯粹的同一性；所有的差异都仅仅来自于形式，从而只是观念的或定量的。”[[41]](#footnote-41)（SW 2,175）

在1803年——站在同一哲学的高度——谢林全心全意地肯定了将自然世界中明显的质的差异还原到量的差异的立场，拒绝任何宣称存在绝对质的差异的观点。

## （二）体系优先性：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引言中的第一个目的，也就是“同一性哲学”之发生的“自然哲学解释”，或者说自然哲学的体系优先性。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总结谢林给予自然哲学体系优先权的两个原因。首先，先验哲学关注的是精神的结构及其通过自我的精神活动与自然的统一（谢林称之为“主观的主-客体”），而自然哲学关注的是物理现实将自身提升到自我的层次，即通过一个严格的自然过程首先产生精神并与之同一（谢林称之为“客观的主-客体”，同时也是“纯粹的主-客体”）。因此，自然哲学体现为“一个完整的序列，从自然中最简单的事物到最高级和最复杂的事物”，[[42]](#footnote-42)（SW 4,89）而先验哲学家只是理解了这一完整序列的一部分，即“最高级和最复杂的事物”——精神或者自我意识。

但是，在此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反驳：尽管我们承认，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但先验哲学同样也是探寻——尽管是以从高到低的方式——精神与自然的同一，把自然整体纳入视野之中。为什么只有自然哲学才是“同一性哲学”的发生之路？这一点涉及到谢林独特的并以之与费希特-埃申迈耶尔拉开距离的方法论思考，我们将在本章的下一节作出回应。

谢林同意自然哲学体系优先性的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有关，它可以从自然的自我决定和自我满足的特性来理解，至少自1799年以来，这一直是谢林自然哲学著作的核心组成部分。例如，《初稿》的开篇就明确指出，任何成功的自然哲学都需要遵循两个原则：自主原则（autonomy）和自足原则（autarchy）[[43]](#footnote-43)（SW 3,17）。对谢林来说，**自然是自主的**，即自我决定或自我立法，因为自然将自身转化为生命，并最终转化为精神，是一个独立的过程，不需要任何干预来推动自然的多样化；**自然是自足的**，因为这一物理过程可以仅参照自然的结构来充分解释，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解释原则。在《概念》中，谢林解释了这一观点的后果：一旦自然的自主性和自足性得到承认，自然哲学就被证明是第一哲学。因此，尽管《初稿》将自然的自主和自足原则嵌入了一个平行科学体系中，但谢林在1801年开始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体系，将他早期的观点从理性一元论的角度彻底化。

而促使谢林放弃早期将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并置的平行主义而转向自然哲学的体系优先性的过程，埃申迈耶尔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他在《自发性=世界灵魂》中挑战了谢林《初稿》中关于自然自主和自足的假设，从而激起谢林不仅捍卫这一立场，而且如上所述使其彻底化。

从埃申迈耶尔的角度来看，我们将自然视为生命和精神的基础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将自然设定（posit）为我们有机存在的产物。也就是说，因为“自然本身”对埃申迈耶尔来说，“只不过是简单的存在，纯粹的消极性”，自然明显的自我决定活动是我们自己的自我决定活动的投影（projection）。因此，这种活动的最初来源不是自然，而是将自然设定为自我决定的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在《自发性=世界灵魂》中，埃申迈耶尔声称谢林的根本错误是将“变易原则”（principle of becoming）视为自然本身的内在原则[[44]](#footnote-44)。可以肯定的是，埃申迈耶尔认识到，通过一个主体的行为，自然似乎确实受到自主发展的驱动，导致其作为一个复杂的物质世界的分化，但是这一分化的最终来源必须是“自我”的自发性。而谢林坚持自然为自身立法，是他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明显承诺的结果。因此，埃申迈耶尔声称“经验主义的坟墓”[[45]](#footnote-45)——也就是谢林失败的自然哲学——内在地将人引回到先验哲学的理性主义。

然而，从谢林的观点来看，先验唯心论者仅仅预设了我们知识的限度，从而将理性思维固定为有限性。与这种观点相反，他认为哲学理性只有在超越意识的有限视角从而进入自然的理性结构时才是完全理性的。

因此，理解埃申迈耶尔和谢林在自然规定性来源的区别的一个方法是在根据他们各自的理性概念。虽然他们同意所有的自我规定都是理性的，但埃申迈耶尔无法理解理性的自我规定除了精神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来源。对埃申迈耶尔来说，在自然过程中出现的任何自我规定——因此也就是任何理性——都必须能够追溯到意识活动。相比之下，谢林能够论证自然是自主的，因为他认为自然是内在理性的；他相信自然哲学是可能的，因为他认为哲学理性可以沉浸在自然的理性结构中。

尽管埃申迈耶尔正确地指出，“经验主义的坟墓是理性主义的复活”，然而，通过简单假设意识的事实，埃申迈耶尔的先验观点在经验主义的十字架上消亡了：其全部的先验演绎都是基于一个经验事实：意识存在。相比之下，谢林的自然哲学对意识的存在及其结构不做任何假设，相反，它试图通过沉浸于无意识自然的自我规定结构来克服先验唯心论的残余经验主义。这就涉及到谢林独特的方法论思考——沉浸式抽象。

## （三）方法论——超越式抽象与沉浸式抽象

抽象（abstraction），只隐藏在康德认识论的背景中。[[46]](#footnote-46)费希特从中发现了一种足以产生哲学洞见的抽象形式，用以解释哲学在认识论上何以可能。

惠斯勒（D. Whistler）总结了费希特的抽象方法论的如下特征：[[47]](#footnote-47)

（1）抽象是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开端，即先抽象，再建构（construction）[[48]](#footnote-48)：哲学家必须从经验中抽象出来，才能获得纯粹自身设定的“自我”，然后才能在其眼前重现“自我”建构现实的过程。

（2）抽象不诉诸肯定或否定的过程，即不会主动取消抽象的对象，而是变得对它漠不关心（indifferent）。用费希特的话来说，从某一存在中抽象，并不意味着设想非存在，“因为通过这样做，一个人只是否定了存在的概念，而不是从中抽象出来。存在的概念在此没有被考虑到——无论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49]](#footnote-49)因此，抽象的元素不以任何形式存在：抽象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在漠不关心中进行超越。

（3）抽象具有限制，即惠斯勒所称的“免疫先验性”（immune transcendental），“一个人应该继续从一切可能的事物中抽象出来，直到持存的是完全无法被抽象的存在，即纯粹自我。”[[50]](#footnote-50)抽象的先验条件本身不能被抽象出来，这是抽象活动赖以发生的基础，也是其所能进行的极限。费希特在这里的论点本质上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翻版。

而《概念》标志着德国唯心论对抽象概念的运用达到了新的思维阶段，谢林在此发展了一种“沉浸式抽象”，以与费希特式的“超越式抽象”区别开。

谢林在开篇重申了在《初稿导论》中已经说明的论点，“许多被‘自然哲学’一词误导的人期望对于自然现象的先验演绎……然而，对我来说，自然哲学是自足的整体，是一门完全不同于先验哲学的科学。”[[51]](#footnote-51)（SW 4,81）谢林一反德国唯心论的先验论证传统，否认他对自然哲学的实践可以位于这一传统。

那么，如果自然哲学不再涉及先验论证的形式，还有什么可供选择的方法呢？谢林首先区分了“关于哲学的哲学”与“哲学自身”，前者即就是康德-费希特-埃申迈耶尔所坚持的先验立场，后者即谢林的自然哲学立场。先验哲学之所以只是“关于哲学的哲学”，在于其永远无法超越先验主体即自我意识的约束，不可避免陷入“自我意识的循环”[[52]](#footnote-52)（SW 4,85）。

由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所奠定的基本认识论原则在于，认识的对象必须与认识的主体同一，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主客体达到同一。在《概念》中，谢林比较了知识学（即费希特和埃申迈耶尔）的解决策略和他自己的解决策略：在费希特-埃申迈耶尔那里，达到主客体同一的手段是改变（或者用谢林的术语来说，提升到更高的Potenz）客体（即自然）直到它与主体同一：将自然提升到精神中，并使其成为一种可以被精神完全解释的感觉或知觉。这对于谢林来说是无效的，因为那些没有被提升到意识的Potenz的客体仍然对哲学家隐藏着。“（对于费希特来说），除了进入意识的那一刻，我看不到任何客观的对象……”[[53]](#footnote-53)（SW 4,84）谢林认为，实在性既存在于意识的Potenz，也存在于无意识的Potenz，并且前者是派生的。因此，仅仅把哲学方法局限于将实在性提升到意识的层次，就等于把较低的、无意识的Potenz拒之门外，也就是说，通过先验方法，“我假设自己已经处于最高的Potenz中，因此整个问题只有在这个Potenz中才能得到回答。”[[54]](#footnote-54)（SW 4,85）

谢林由此提出了自己的解决策略：与费希特相反，不再是改变客体以与主体同一，而是改变意识，使之与无意识的实在性同一。换言之，不是让自然与意识同一（将自然提升到更高Potenz的过程），而是让意识与自然同一（将意识降低到更低Potenz的过程）。从而，哲学家也将直观降低到更低的Potenz，以便成为未被察觉的、隐藏的自然世界。也就是说，哲学家必须变得像自然一样，将自身沉浸到自然之中，从自然的角度进行哲学思考。这就是所谓的“沉浸式抽象”：“只有通过把所有哲学化的对象降低到更低的Potenz，才有可能看到客体的最初存在形式，然后从一开始就用这个还原到最低Potenz的对象来建构。这只有通过抽象才有可能。”[[55]](#footnote-55)（SW 4,85）

哲学从知识学的高Potenz转变而来，并从低Potenz中寻找高潜能阶次如何形成的线索，这种抽象的方法，彻底地将谢林的自然哲学从费希特-埃申迈耶尔的知识学传统中抽离开来，“通过这种抽象形式，一个人就从知识学的领域转移到了纯粹理论哲学的领域。”[[56]](#footnote-56)（SW 4,85）

因此，谢林将抽象彻底化，超越了费希特的抽象限制，即“免疫先验性”：哲学不仅从经验中抽象，而且从先验自我中抽象，这就把哲学家带到了“哲学自身”，或者说哲学的“根”，即在提升到更高Potenz之前的主-客体同一性，即Potenz 0。

从而，我们也回答了本章第二节提出的一种可能的先验哲学立场的反驳：对谢林来说，先验哲学所达至的同一性永远都是片面的，因为其所依赖的抽象方法是不彻底的。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沉浸式抽象是何以可能的，或者说，主体如何改变自身以与客体同一？在更基本的逻辑层面上，从主体中抽象出来似乎并不能让人达到主-客体同一性。也就是说，如果在自然哲学中所发生的是从主体中抽象出来的，那么主-客体的主观因素，因此也是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似乎已经脱离了自然哲学的范围。

但是如果注意到这里存在两个主观性（同时也是客观性）的概念：一个主观性在抽象的行为中被移除，另一个主观性永远是在抽象发生后留下的主-客体的组成部分，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按照谢林的说法，费希特的理智直观的基础原则是由主体和客体在主体中的同一性构成的，因此，沉浸式抽象所悬置的只是这个原则中的“在主体中”部分，也就是说，只是理智直观所发生的主体的主观性，而主体和客体本身的同一性完好无损。换言之，谢林希望宣称的是，自然哲学对主客体同一性的要求，不受哲学从主观性抽象开始这一事实的影响。因此，毫不奇怪，谢林明确地提请人们注意“客观性”的双重含义：“对我来说……客观性本身同时是实在的和观念的；这两者从来没有分离过，而是原初共存（甚至在自然中）。”[[57]](#footnote-57)（SW 4,86）

从而，主-客体获得更高的Potenz的过程，正是自然成为主观意识对象的过程。因此，进行抽象，就是要取消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自然的主-客体被视为主观意识的客观对应物。抽象试图使哲学家回到客观自然和主观意识的源头，其中没有任何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从而，“在一般意识中出现的自我和自然之间的对立完全消失，因此，自然=自我，自我=自然。”[[58]](#footnote-58)（SW 4,91）这是通过哲学家降低到Potenz 0的结果。谢林的自然哲学正是从这种仅仅是对立部署的主观性中抽象出来的，而不是从主观性本身抽象。[[59]](#footnote-59)

正是通过抽象，谢林达至了“同一性哲学”的开端。因此，《阐述》正文的开场白是：“我称理性为绝对理性，或者说，理性被认为是主观和客观的完全无差别……要把理性设想为绝对的，从而达到我所要求的立场，就必须从思想中抽象出来。对于执行这种抽象的人来说，理性立刻就不再是主观的东西。……理性当然也不能再被看作是客观的东西……”[[60]](#footnote-60)（SW 4,114）

# 二、白昼（1801）：“同一性”的“无差别模式”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埃申迈耶尔对于谢林“同一性哲学”立场的形成的重要性：

一方面，埃申迈耶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对于当时德国哲学界的影响，而埃申迈耶尔作为二者的忠实拥趸，在与谢林的自然哲学争论中将谢林与二者的距离逐渐拉开：谢林由此放弃了自然哲学-先验哲学的平行性，赋予自然哲学体系优先性，并诉诸彻底的一元论以突破康德动力学的藩篱，同时通过由“质”到“量”的存在论转变，即一切存在作为“同一性”不同程度的体现，没有本质的差异，以所谓的“绝对唯心论”与康德-费希特-埃申迈耶尔的“相对唯心论”划清界限。

另一方面，在埃申迈耶尔为动力学和先验论证辩护并质疑自然哲学独立性的合法性时，谢林则进一步提出了标志“同一性哲学”开端的“沉浸式抽象”方法论，以所谓的“客观唯心论”与康德-费希特-埃申迈耶尔的“主观唯心论”划清界限。

但是，除了以上区别，1801年的《阐释》——对“同一性哲学”的首开先河——的确凸显了埃申迈耶尔自然哲学的许多特征：定量地解释了差异；把两个磁极之间的无差别点置于形而上学的核心；平衡、优势、相对无差别和绝对无差别、Potenz等等重要术语的使用。

因此，在《谢林历史考证版全集》（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第十卷的编者前言中，《阐述》被视为对埃申迈耶尔的“回归”[[61]](#footnote-61)；而让克（B. Rang）更是声称对《阐述》的任何恰当的欣赏都依赖于对埃申迈耶尔自然哲学的精确重构。[[62]](#footnote-62)

对谢林来说，埃申迈耶尔所设想的关于基本力的比例的差异只是一个更普遍的纵向序列的最基本的阶段或者层次，而这个更普遍的序列从动力学层次延伸到质的层次，最终达到了有机的层次。因此，如果自然的质，如化学性质，处于这样一个更复杂的序列中比最基本的动力学阶段更高的阶段，那么就有可能从量的角度去设想质。谢林把这一序列中的各种阶段称为Potenz。

尽管所有研究者都会将谢林对于Potenz的运用归结到埃申迈耶尔，但后者一直未被重视，学界普遍地更愿意从词源学和更间接的思想来源入手。[[63]](#footnote-63)但无疑，谢林是直接地从埃申迈耶尔处获得Potenz概念并加以改造，因此，我们将更加注重谢林Potenz概念的埃申迈耶尔元素，即量的差异和磁力线[[64]](#footnote-64)。

## （一）量的差异、磁力线与Potenz

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讨论的，在康德之后，埃申迈耶尔试图把物质**质**的的多样性还原为两种对立的基本力之间的各种**量**的比率，采取了Potenz序列的解释模式。这种模式以二元论为前提，即排斥力和吸引力的对立，而且，正如他在1801年7月写给谢林的一封信中欣然承认的那样，两种基本力之间的非同一性模式将作为主要的存在论原则[[65]](#footnote-65)。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从《初稿》到《阐述》，谢林表达了对这样一种辩证存在论的不满：他希望保留埃申迈耶尔关于Potenz序列的观点而去除其辩证基础。

谢林在《初稿》和《初稿导论》中对埃申迈耶尔最初的论战的一部分正是针对后者使用吸引力和排斥力来构建质的规定性，他对行为体的短暂兴趣也意味着谢林试图寻找康德-埃申迈耶尔动力学的替代品，即构建自然多样性而不必依赖对立的基本力之间的辩证相互作用。换句话说，在1799年，谢林的自然哲学中已经有一种倾向，即在不诉诸基本二元论的情况下解释自然世界的多样性，或者说，不诉诸非同一性原则解释同一中差异的出现。

这一点在《概念》中得到凸显，“所有的二元论都将永远消灭，一切都将成为绝对的一。”[[66]](#footnote-66)（SW 4,102）在整个文本中，谢林一直强调，一切总是在同一中找到自身：无法逃避、创造或者破坏它。[[67]](#footnote-67)一切事物总是已经是同一性，而且仅仅是同一性，这既包括提升到意识Potenz的自然（费希特式的先验唯心论的自然），也包括处于较低层次的、无意识Potenz的自然（思辨的自然哲学家由以开始的自然）。因此，在《概念》中，自然哲学家的任务不是像谢林在1799年那样，从一个预先存在的同一性中解释多样性的产生，也不是像埃申迈耶尔那样，从两种不可还原的基本力中建构物质，而是为了描绘出同一性的诸Potenz，也就是说，描绘出同一性的较高Potenz如何从较低Potenz中产生的升幂过程，或者用谢林自己的话说，“让意识的主-客体从纯粹的主-客体中产生”。[[68]](#footnote-68)（SW 4,87）

总而言之，谢林试图构建由同一个因素构成的升幂序列，也就是同一性的诸Potenz（而不是两种基本力的对应比例）。同一性的强度在整个序列中增加或减少，以解释存在形式的多样性。

在1801年《阐述》中，通过贯彻此前所提到的“抽象”方法论，谢林采取了理性一元论的论证形式，其中“理性”不仅作为事物完全可理解性（充足理由律）的保证，而且还从恰当的哲学观点描述了现实的内容。因此，谢林激化了指导所有哲学研究的假设：充足理由律普遍成立，现实是按照理性构建的，“一切本质上等同于理性的东西，与理性是一体的”。（SW 4,116）由此谢林确立了一系列的等价性：理性=主体和客体的无差别=哲学=自在之物（in-itself）=绝对=“一”=“=”（等号自身）。因此，同一性的法则（A=A）作为“理性存在”的终极法则，也就是“所有存在”的终极法则。从而一切存在之间任何质的差异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一切存在无非是同一事物（绝对同一性）的不同程度（谢林称之为“同一性的量”）的表现，“主词和谓词之间除了量的差异，别无可能。”[[69]](#footnote-69)（SW 4,123）

从而就有三组可能的“同一性的量”：在这个法则中倾向于作为主词的A，倾向于作为谓词的A，以及倾向于它们之间的无差别点（“=”），分别代表主观性强度的优势（preponderance）、客观性强度的优势以及“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完美的量的平衡”（SW 4,127）。这就是同一性的“三重性”。[[70]](#footnote-70)

在著名的《阐述》第46条，谢林用磁力线，即所谓的“构造的直线”（SW 4,137）来表示这一结构：

**A+ = B**  **A = B+**

**A = A**

磁力线对谢林非常重要，因为它展示了Potenz最重要的特性——无限重复。正如磁铁的任何部分都伴随同一磁性结构，如果我们在这条线上取任何一点，在整条线上出现的同一结构将在这一点上完全重现，“同一性被置于整条线上……整体线的结构对于每一个局部也是如此。”（SW 4,137-8）因此，每一个Potenz自身都可以无限地展开为三重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Potenz的这种三重结构绝非所谓辩证法的雏形，二者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瓦尔特·齐默利（Walther Zimmerli）用一篇标题为《自然哲学中的Potenz学说与逻辑学》[[71]](#footnote-71)（Potenzlehre versus Logik der Naturphilosophie）复兴了德国唯心论研究中一个古老的争论：黑格尔对自然的辩证逻辑构想与谢林对自然的Potenz形而上学构想。事实上，尽管辩证法也有类似的三重结构，但这三个要素是通过自否定（self-negating）的否定性而相继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一种逻辑形式内在地否定自身，从而产生了一种在质上不同的新形式。而谢林设想从A到A2的发展是通过自身的重复来进行的，这一过程是非时间性的，产生的新形式也不是“非A”，而是一种自身强化的“A2”，正因如此，诸Potenz是可以共存的。换句话说，黑格尔的辩证法设想的对象之间是对立和扬弃的关系，“统一”是**以**对立和差异**为前提**的，而谢林Potenz学说设想的对象之间没有对立和扬弃的关系，“同一”是对立和差异的前提。

## （二）同一性的“无差别”模式

除了上述埃申迈耶尔的自然哲学元素，谢林在《阐述》中还回到了本质和形式的传统，构想了三种类型的同一性：本质同一性（essential identity）、形式同一性（formal identity）以及限定同一性（determinate identity）。

（1）本质同一性

如果以A=A来表述同一性法则，那么本质就对应于符号“=”，作为主词和谓词的“A”则是非本质的。因此，同一性法则不应被理解为以综合的方式，将两个不同的元素（即作为主词的“A”和作为谓词的“A”）结合起来并使之同一，甚至不应被理解为同一反复或者重复。只有符号“=”表示了“绝对”的本质。谢林写道：“命题A=A，表达的既不是A本身的存在，也不是其作为主词或谓词。相反，通过这一命题所设定的唯一存在就是同一性自身。”（SW 4,117）

（2）形式同一性

当然，“同一性”体系的基本前提就是，本质不能脱离形式而存在，形式同样不能脱离本质而存在。因此，虽然哲学家能够将二者孤立起来讨论，但这只是一种人为操作，实际上，二者是绝对不可分离的：本质总是被形式化。

因此，绝对不是作为纯粹的本质（即不仅仅是作为“=”）而存在，同时也是作为形式（A=A）而存在。简而言之，“=”必须以“A=A”的形式存在。在此重要的是，“A=A”所表达的与“=”完全相同，绝对的本质和形式都是同一性的显现。

（3）限定同一性

由于A=A不仅是“同一性”的法则或者形式，同时也是一切存在物的终极法则，因此，一切存在物都通过这个形式被设定存在（posited through）。

由此，谢林得到了著名的“同一性的同一性”（the identity of identity）（SW 4,121）。展开地说，“同一性”（本质）被设定，通过“同一性”（形式），作为“同一性”（限定）。不诉诸否定性范畴，就无法从根本上定性地区分各种存在形式，质最终被归结为量。这正是同一性哲学的“无差别模式”：否定、质的差异和对立消失不见，因为一切存在者都是同一性在不同Potenz的显现。

# 三、暗流！（1801）：“同一性”的时代争鸣

以上，我们试图通过“回到”埃申迈耶尔，阐明谢林“同一性哲学”的发生与核心概念。接下来，为了更好地理解“同一性”，我们将“回到”1801年这一时间节点，通过比较黑格尔、费希特和埃申迈耶尔各自对于谢林全新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回应，在更为广阔的时代争鸣中考察谢林的“同一性哲学”。

## （一）黑格尔的回应

出版于1801年9月的《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72]](#footnote-72)，既是黑格尔的第一部出版的哲学论文，也是少数对谢林《阐述》抱有友好态度的的回应。

在表明黑格尔的观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对19世纪前后，德国哲学界对待“同一性”的各种不同的声音。

1800年前后，许多哲学家已经认识到，为了理解知识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哲学本身的实践得以可能，必须假定或证明主体和客体的原初同一性。任何对现实的充分描述都必须借助于这种同一性，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世界——包括自然和精神。正如施瓦布（P. Schwab）所言，“一个逻辑基础站在早期后康德哲学的核心，即哲学作为一个系统的基础，从第一个‘绝对同一性’原则出发，围绕着命题A=A，并解释这个A=A的前提、结构和含义”。[[73]](#footnote-73)当然，在这样一个同一性被认为是实在的超验基础或者实在自身，它只在“自我”中有效或者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相关，它具有调节性意义还是构成性意义，它是否具有因果力量等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遗憾的是，许多关于德国唯心论的论述倾向于把这种多样性作为朝向一种标准的单一模式的运动来重建：所有这一切对于同一性的探索，最终走向了黑格尔的辨证模式。在辩证模式中，为了使同一性被视为绝对的，它必须克服与非同一性相对立的自我同一性和和有限同一性。也就是说，绝对同一性只能被理解为“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同一性”[[74]](#footnote-74)。

对于黑格尔来说，对立面之间明显的差异，在绝对中既得以保留，又被废除。只有从一个较低的认识立场——“反思”（reflective）——才无法把两者的同一性理解为对立面的统一，这种思维的失败只会导致对“矛盾”和“二律背反”的滥用。而从真正“思辨”（speculative）的立场来看，同一性和非同一性是一致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差异使它们的统一成为可能。从这个思辨的观点来看，矛盾成为“绝对物的纯粹形式的现象”，二律背反则是“知识与真理的最高的形式上的表达”[[75]](#footnote-75)。对于黑格尔来说，正确地进行哲学思维，就是要认识到差异（被构想为非同一性）在绝对同一性中的核心构成作用。

回到《差别》，黑格尔在其中把上述立场概括为谢林的立场。然而，我们已经试图说明的正是，谢林通过与埃申迈耶尔的交流，产生了一种明显的非辩证式的同一性概念。因此，尽管黑格尔的态度是友好的，但正是由于他对于谢林《阐述》中形而上学的曲解，导致了后世对于谢林思想的更大程度的误解。

有趣的是，在《阐述》出版之后，谢林的确出现了转向黑格尔辩证模式的趋势。杜辛（K. Düsing）对这个故事进行了一次经典的复述，对他来说，谢林在1801年的发展，是从同一性的“无差别模式”转向“黑格尔模式”（即辩证模式）的转变，其动机则是前者的不足。[[76]](#footnote-76)

一个更微妙的版本来自弗兰克（M. Frank）。虽然弗兰克不认为谢林对同一性成熟描述与黑格尔相同，但他仍然认为，黑格尔在不同的情况下引入的辩证模式，比谢林在1801年初所写的任何东西都更接近谢林的实际立场。[[77]](#footnote-77)

弗兰克立场的含义是，谢林从1801年初开始的著作，是一种将信将疑的立场，而《阐述》作为“匆忙写就”的作品并没有充分表达出来“对差异敏感的同一性思想”。根据弗兰克的说法，黑格尔和谢林在1801年初都参与了一个共同的项目，即理解一个在自身内包含对立的绝对同一性；他们在细节上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但都致力于一个广泛的辩证模式。

## （二）费希特的回应

费希特在1801年初夏的一份笔记中记录了对于《阐述》的回应[[78]](#footnote-78)，他坚持认为，在形而上学结构中，对立和同一在形式上同样重要，而谢林恰恰放弃了对立原则（即知识学的第二原则）。并且谢林在《阐述》中把量的差异作为对立差异的替代品，这对于费希特来说是完全不足够的，因为量的差异，或者是对立的结果，或者根本就构不成差异。因此谢林诉诸于量的差异是试图把实质性的差异转换到假装排除任何差异原则的体系。如果绝对被认为是无差别的，那么绝对中就不存在任何量和关系。

纳萨尔在《浪漫的绝对》（*The Romantic Absolute*）以费希特的批评作为反思谢林1801年“同一性哲学”的跳板，将费希特对于谢林的批评重构如下：[[79]](#footnote-79)

（1）绝对作为无差别，完全是消极的；

（2）尽管绝对本身不包含差异，但它位于一个假设差异的更大框架内：如果绝对与它所呈现的理性思维结构不同，那么对立的差异就已经被预设了，因此这种差异是一个与同一并存的平等原则；

（3）作为无差别的绝对，无法解释差异的根源，无法解释从一到多的转变，而诉诸于量的差异不仅不能弥补这一缺陷，而且突出了绝对的矛盾性；

（4）如果绝对是在量的形式下，那么它就不是绝对的；事实上，通过将绝对形式化，谢林无意中将其对象化了。

正如杜辛和弗兰克一样，纳萨尔也把谢林在《概念》和《阐述》中展现的“无差别模式”视作一个不完整的版本，在谢林后来的发展轨迹中部分得到了改进。但与二者不同的是，纳萨尔并没有把黑格尔《差别》的影响看做是谢林改进的催化剂，而是转向费希特和谢林的对话，认为谢林在《布鲁诺》以及之后的著作中转向新的“同一性”模式是对费希特批评的回应。

## （三）埃申迈耶尔的回应

此前的研究总是在上述二者之后戛然而止，但跟随惠斯勒，我们理应提到埃申迈耶尔本人对其与谢林争论催生的“同一性哲学”的回应。

在黑格尔《差异论文》出版之前，也在费希特给谢林发来他对《阐述》的批评的几个星期之前，埃申迈耶尔已经给谢林写了一封对《阐述》展开全面批评的信[[80]](#footnote-80)，作为1801年谢林-埃申迈耶尔之争的最后文件之一。

在信中，埃申迈耶尔支持了一个广义的费希特式的关于同一和差异关系理解的模式，并以之作为谢林“无差别模式”内在问题的解决。

**埃申迈耶尔的批评要点如下：**

（1）首先，自然的差异只能从费希特的主观唯心论出发来理解，即自我内部的原始对立。谢林将绝对同一性作为哲学体系的唯一基础，那么A=A确实符合费希特的第一原则，即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无条件的；但费希特的第二原则，即—A≠A，消失不见。换句话说，费希特假设的最初的对立在谢林的体系中完全消失了，其第三原则也转变成非对立的，以定量的手段，即通过“同一性”自身的不同优势来解释差异。

（2）其次，除了支持费希特模式之外，埃申迈耶尔还攻击谢林关于同一和差异的解释模式自身的一致性。这一批判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它假定谢林的形而上学确实认识到了理解现实所需要的各种差异，然后质问这样一种谢林也同样追求的“同一性”是否可能；在第二阶段，他假定谢林对同一性的描述的确是可行的，然后质问基于此形成的差异是否可能。总而言之，埃申迈耶尔关注的是两个实体之间的限制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存在论上的断裂，使它们彼此分离和独立；因为如果实体要从彼此之间区分开来，那么只有在他们之间有异质的东西出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他试图表明，谢林在《阐述》中以各种方式阐明的“同一性”一元论，都未能说明这种限制（特别是第46节的磁力线），这意味着谢林不可能在他的体系中同时为同一和差异提供位置。

# 四、黑夜？（1801-）：“同一性”的拨乱反正

上述回应的一个共同点在于，由于谢林在1801年提出的“同一性”的“无差别模式”对于差异解释的失败和无力，而批评并拒绝了该模式。而谢林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随后的思考中进行转变：在《布鲁诺》中，谢林呈现了一种黑格尔亲缘性的“辩证同一性”模式，即“同一与对立的同一性”（identity of identity and opposition）（SW 4,235-239）；在《对我的哲学体系的再阐述》中，谢林表达了通过差异而构造的多元“同一性”；在二版《理念》以及《哲学与宗教》中，谢林提出了著名的有限与无限之间的“渗透式塑造”（einbilden / in-forming）。从而“匆忙写就”的《阐述》常常被视作一个短暂的偏离。如此看来，谢林1801年的“同一性”哲学的确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但是，我们想建议的是：

（1）通过回到谢林与埃申迈耶尔争论的语境，《阐述》的思想事实上是谢林长期思考的总结（绝非一时兴起），是关于自然哲学较长轨迹的顶点：仅从同一性范畴来建构现实。正如瓦特所言，《阐述》“与谢林告诉埃申迈耶尔他将要做的事非常吻合——展示自然的统一和活力，而不诉诸任何基本的二元论。”[[81]](#footnote-81)

（2）当然，我们也不是否认谢林作品中存在的其他的“同一性”模式，杜辛和弗兰克已经为我们证明了谢林思考同一性的多样化。但是谢林事实上并未放弃1801年《阐述》中的“无差别模式”，在《哲学与宗教》中，谢林再次回到这一模式，并且将之前含蓄的观点明确化。我们接下来处理这一点。

## （一）“同一性”“无差别模式”的延续

我们之前已经描述了“无差别模式”的特征，最重要的是，谢林建立了一个不涉及差异的存在的形成模式：同一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本质，作为形式，作为限定。这种模式只利用同一性就可以阐明所有的规定性（determination）。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自从雅各比（Jacobi）以来，德国唯心论中最重要的对于规定性的思考就是斯宾诺莎式的格言，“一切规定都是否定的”。谢林在《阐述》中对这一传统提出了质疑，而经过谢林短暂的偏离“无差别模式”的尝试，在1804年的《哲学与宗教》中，谢林再次表现出了同样的态度。

一方面，面对埃申迈耶尔以及其他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存在的形成或者规定必然涉及对立面或者实质性的差异，而谢林认为，这样一种认为绝对的自我规定性（即绝对的自我认识）是“自身脱离、自身分割、差异转化”的观点“必须首先加以纠正”。[[82]](#footnote-82)（SW 6,32）

另一方面，谢林也重申了两个“没有过渡”：（1）“从本质到形式没有过渡”（SW 6,30），（2）从无限到有限没有过渡，“没有任何有限事物能够直接产生自绝对者并且直接回溯到绝对者”（SW 6,41）。因此，前者说明“同一性”归根到底还是绝对本身，即绝对的“一”；后者说明绝对的“一”又具有绝对的超越性。

因此，在1804年，谢林继续把绝对即“同一性”理解为不诉诸对立面而设定自身，这表明，在1801年之后，“无差别模式”并没有完全被抛弃，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进，而仅仅是重申和回应。

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与宗教》尽管一直被视为“同一性哲学”的转折，但这种转折并非谢林对于“同一性哲学”的基本思想的背离，而毋宁是“同一性”思想的极致表现，从而代表了“同一性”的终结。

正是在这里，谢林的“同一性哲学”受到了一致且猛烈的批评，我们只需要提出黑格尔那太过著名的“黑夜观牛”：“绝对者是一个黑夜，在其中……所有母牛都是黑的”[[83]](#footnote-83)，无论是调侃，醉翁之意不在酒，还是黑格尔的误解或者曲解[[84]](#footnote-84)，这都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了，谢林的“同一性哲学”似乎永远与黑夜为伴。

## （二）“同一性”的极致与终结

通过“无差别模式”，谢林实际上拒绝了从理性的立场，因而也就是从哲学的立场解释实质差异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同一性”对于差异解释的无能，而只是说谢林以“不解释”的方式来“解释”实质差异。

哲学家不能提供对于差异或者有限的解释，因为这需要离开绝对的立场。谢林在此表现出了斯宾诺莎主义的极致：当莱辛（Lessing）要求雅各比具体说明“斯宾诺莎主义的精神”时，雅各比著名的回应是，“那无非是古老的从虚无中无物能够产生（a nihilo nihil fit）的学说……斯宾诺莎拒绝了任何从无限向有限的过渡。”[[85]](#footnote-85)谢林遵循了雅各比的观点：没有从绝对的立场向有限的过渡。在作为理性的现实描述和作为有限性的描述以及产生有限性的各种差异的描述之间，有一条坚实的界限，按照谢林的说法，这是哲学家不能跨越的界限。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瓦特所说，在康德明确拒绝形而上学之后，谢林从事的是“康德式的形而上学”的真正含义：“同一性哲学”将哲学家限制在一块比康德的“真理之岛”更具限制性的土地上，也就是说，尽管谢林有着明显的形而上学野心，但他的确恢复了康德批判哲学的核心精神——界定哲学范畴的合法使用。但谢林真正的推进也恰恰在此：理性不再受到限制，但理性仍然无法把握现实。

在《哲学导论》（写于《哲学与宗教》的同年）中，谢林明确地以对待有限者和无限者的态度作为理性哲学判教的标准：

“因此在迄今为止的发展过程中，哲学经历了如下一些层次：

1）首先在**实在**层面上，有三个层次：a)坚持有限者；b)坚持有限者和无限者的绝对对立；c)坚持有限者和无限者的绝对同一性，但这种绝对同一性本身仍然表现为一个实在的东西。

2）其次在**观念**层面上，目前只经历了两个层次：a)从莱布尼茨开始的对于有限者的坚持；b)康德和费希特呈现出来的无限者和有限者的绝对对立。因此这里还剩下一个层次，即达到一种绝对同一性，达到一个绝对的无限者，这个无限者不是与有限者相互对立，而是凌驾于有限者之上，换言之，相对于这个无限者，那个与有限者相互对立的无限者仅仅是它的一个偶性。”[[86]](#footnote-86)（SW 6,130）

我们可以看到，谢林的“同一性哲学”作为近代形而上学的最终形态，在彻底的理性一元论的立场下，现实仍然无法得到完全地把握，这也**预示**着近代形而上学的终结（尽管这需要伴随着谢林最终的哲学方案才会凸显出来）。

而在德国唯心论发展过程中，谢林的“绝对观念论”作为最终形态之一（另一自然是黑格尔），其内在要求在于：要达到真正哲学的，因而也是理性的、绝对的立场，必须以“沉浸式抽象”为前提，以非肯定和非否定的方式超越一切差别和对立，达到“无差别”，因此，抽象的结果必然是绝对超越的“一”。但是，恰恰是因为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抽象，绝对的“一”中包含着尚未展开的“全”。[[87]](#footnote-87)这自然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诉诸彻底的理性一元论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一”对于“全”的吞噬，“全”必然无法在“一”中得到展开。

正是这种**“单一本原”**模式的失败，必然导出谢林在《哲学与宗教》中有限之“堕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区分（SW 6,40）[[88]](#footnote-88)；以及《论人类自由本质及相关对象》（《自由论文》）中关于“实存者”和“实存的单纯根据”（SW 7,358）的**二重本原**的区分以及超越于二者之上的，“先行于全部根据的东西，亦即绝对意义上的绝对者，‘非根据’”；[[89]](#footnote-89)（SW 7,408）并最终导向谢林晚期关于否定哲学（即“纯粹理性的科学”）和肯定哲学的区分。

因此，作为德国唯心论的最终形态**之一**，谢林“同一性哲学”在解释单一本原的超越性与全体性上的失败，**预示**了德国唯心论的终结。

# 尾 声

长期以来，谢林的“同一性哲学”一直被认为是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线性道路上的偏离，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一系列对于“同一性哲学”的批判可以简单罗列如下：抽象、缺乏一个恰当的开端、单调的形式主义、教条、不能解释实质性差异的形成、建立在神秘和不可验证的理智直观基础上、精英主义、反动。更糟糕的是，这些不仅是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的批评，也是许多谢林主义者的共识，甚至是晚期谢林本人的批评。

但我们仍然进行了以上的回顾。我们试图证明的不是“同一性哲学”的成功，而是它不应该以这些方式失败：

（1）首先，谢林展示了一条走出敌视自然的精神-主体性哲学的自然哲学道路。尽管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导致了传统教条主义的倒转，但这种倒转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更具破坏性的模式，因为它以一种新的二元论教条主义——由笛卡尔发起，康德体系化，费希特完善的近代主观唯心论，否定了作为“自我”产物的自然的客观现实性和内在价值。这种感性自然的贬值，其根源在于近代哲学将思考的人类主体提升到绝对的地位，这种“我思”的膨胀，导致了人类主体虚荣的神化，而随之而来的代价就是谢林所预见的“自然的毁灭”[[90]](#footnote-90)。（SW 5,274）

（2）其次，从谢林思想的连续性来看。谢林晚期关于Was（所是）和Dass（存在者的实情）的区分（SW 11,58），关于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的区分，都与1801年的“同一性哲学”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谢林本人如此看重这一方案的原因，在 1841 年去柏林接替黑格尔教职的首场演讲中他就强调，这一方案是自己“为哲学史成功写上的一页”。而这一页的意义就在于，近代形而上学以及德国唯心论的最高诉求失败的**预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聚集。

（3）最后，“同一性哲学”无疑是失败的，但我们借用一下黑格尔的“黑夜观牛”：黑夜中，所有的母牛当然都是黑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绝对的黑夜才会转化成“知识的白昼”！（SW 4,403-4）

# 参考文献

**一、中文原著：**

1. 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2. 谢林：《布鲁诺》，庄振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3. 谢林：《学术研究方法论》，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4. 谢林：《哲学与宗教》，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5.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6. 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7. 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王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8.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9. 黑格尔：《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宋祖良、程志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1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1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二、外文原著：**

1. F. W. J. Schelling. *Sämmtliche Werke*, 14 Bände, von K. F. A. Schelling, Stuttgart: Cotta, 1856–61.
2. F. W. J. Schelling, *Briefe und Dokumente*, von Horst Fuhrmans, Bouvier, 1962–75, 3:222.
3. Schelling, *Ideas for a Philosophy of Nature,* Errol E. Harris and Peter Heath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4. F. W. J. Schelling, *First Outline of a System of Philosophy of Nature*, Keith R. Peterson(trans), SUNY Press, 2004.
5. F. W. J. Schelling, *On the True Concept of Philosophy of Nature and the Correct Way of Solving its Problems,* Judith Kahl and Daniel Whistler(trans), in *The Schelling– Eschenmayer Controversy 1801*,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0.
6. F. W. J. Schelling, *Presentation of my System of Philosophy,* Michael G. Vater and David W. Wood (trans.), in *The Philosophical Rupture between Fichte and Schelling,* SUNY Press, 2012.
7. Eschenmayer, *Spontaneity = World Soul*, Judith Kahl and Daniel Whistler(trans), in *The Schelling– Eschenmayer Controversy 1801*,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0.
8. J. G. Fichte, *On the Presentation of Schelling’s System of Identity*, Michael G. Vater and David W. Wood (trans.), in *The Philosophical Rupture between Fichte and Schelling,* SUNY Press, 2012.
9. G. W. F. Hege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chte’s and Schelling’s System of Philosophy*, H. S. Harris and Walter Cerf(trans.), SUNY, 1977.
10. F.H. Jacobi, *The Ma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eorge di Giovanni,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三、中文论著：**

1. 翟灿：《艺术与神话：谢林的两大艺术哲学切入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2. 先刚：《哲学与宗教的永恒同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 王丁：《本原的二重性与统一——论谢林最终的哲学方案》，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4期，第13-20页.

**四、外文论著：**

1. Michael G. Vater, ‘Introduction to F. W. J. Schelling, *Presentation of my System of Philosophy*’, in *Philosophical Forum* 32.4 (2001).
2. Anton Braekman, ‘From the Work of Art to Absolute Reason: Schelling’s Journey toward Absolute Idealism’, in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2004).
3. Benjamin Berger and Daniel Whistler, The Schelling– Eschenmayer Controversy 1801,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20.
4. Dalia Nassar, *The Romantic Absolute: Being and Knowing in Early German Romantic Philosophy 1794–1804*,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5. Iain Hamilton Grant,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 Continuum, 2006.
6. Iain Hamilton Grant, ‘Philosophy become Genetic’, *The New Schelling*, Bloomsbury Academic, 2004.
7. Frederick C. Beiser, *German Idealism: The Struggles against Subjectivism, 1791–180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8. Jean-François Marquet, *Liberté et existence: Étude sur la formation de la philosophie de Schelling*, Gallimard, 1973.
9. Daniel Breazeale, ‘“Exhibiting the particular in the universal”: 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 and Intuition in Schelling’s Philosophy of Identity (1801–1804)’. In Lara Ostaric(ed.), *Interpreting Schelling: Critical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0. Eckhart Förster, *The Twenty-Five Years of Philosophy: A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trans. Brady Bowm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1. Bernhard Rang, *Identität und Indifferenz: Eine Untersuchung zu Schellings Identitätsphilosophie,* Klostermann, 2000.
12. Xavier Tilliette, *Schelling: Une philosophie en devenir*, Vrin, 1970.
13. Sven Jürgensen, ‘Schellings logisches Prinzip: Die Unterschied in der Identität’, in Christoph Asmuth et al. (eds), *Schelling: Zwischen Fichte und Hegel*, Rodopi, 2000.
14. Philip Schwab, ‘A = A. Zur identitätslogischen Systemgrundlegung bei Fichte, Schelling und Hegel’, in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German Idealism* 12, 2017.
15. Klaus Düsing, *Schellings und Hegels erste absolute Metaphysik (1801–2),* Dinter, 1988.
16. Manfred Frank, ‘“Identity of identity and non-identity”: Schelling’s Path to the “absolute system of identity”’, in Lara Ostaric (ed.), *Interpreting Schelling: Critical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7. W. C. Zimmerli, ‘Potenzlehre versus Logik der Naturphilosophie’. In R. P. Horstmann and M. J. Petry (eds), *Hegels Philosophie der Natur: Beziehungen zwischen empirischer und spekulativer Naturerkenntnis*, Klett, 1986. 309–29.
18. Daniel Whistler, ‘Identity Philosophy’. In Kyla Bruff and Sean McGrath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to Schelling*, Palgrave, forthcoming.
19. Michael G. Vater, ‘Schelling’s Philosophy of Identity and Spinoza’s *Ethica more geometrico*’. In E. Förster and Y. Melamed (eds), *Spinoza and German Ide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56–74.
20. Paul Redding, *Hegel’s Hermeneu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21. Bruce Matthews, *Schelling’s Organic Form of Philosophy: Life as the Schema of Freedom*, SUNY, 2011.
22. Jörg Jantzen, ‘Eschenmayer und Schelling. Die Philosophie in ihrem Übergang zur Nichtphilosophie’. In Walter Jaeschke (ed.), *Religionsphilosophie und spekulative Theologie: Die Streit um die Göttliche Dinge (1799–1812)*, Felix Meiner, 1994. 74–97
23. Daniel Whistler, *Schelling’s Theory of Symbolic Language: Forming the System of Ident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4. Andrew Bowie, *Schelling and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1993.
25. H. S. Harris, ‘The Cows in the Dark Night’, *Dialogue: Canadian Philosophical Review* 26.4 (1987): 627–44.
26. M. G. Vater, ‘Hymns to the Night: On H. S. Harris's ‘The Cows in the Dark Night’’, *Dialogue: Canadian Philosophical Review* 26.4 (1987): 645–52.
27. G. D. Giovanni, ‘Grazing in the Sunlight: On H. S. Harris's ‘The Cows in the Dark Night’’, *Dialogue: Canadian Philosophical Review* 26.4 (1987): 653–64.

1. 对谢林文本引用的说明：所有谢林文本翻译都以德文版《谢林全集》为参照随文标注（*Sämmtliche Werke*, 14 vols, ed. K. F. A. Schelling. Stuttgart: Cotta, 1856–61.），从英文版翻译和中文版引用的都加以脚注补充。“SW 4,107”表示《谢林全集》第4卷第107页，以下不再说明。 [↑](#footnote-ref-1)
2. 以下简称为《阐述》。 [↑](#footnote-ref-2)
3. F. W. J. Schelling, *Briefe und Dokumente*, ed. Horst Fuhrmans, Bouvier, 1962–75, 3:222. [↑](#footnote-ref-3)
4. F. W. J. Schelling, *Presentation of my System of Philosophy,*Michael G. Vater (trans.), in *The Philosophical Rupture between Fichte and Schelling,* SUNY Press, 2012, p. 141. [↑](#footnote-ref-4)
5. Ibid., pp. 141-2. [↑](#footnote-ref-5)
6. Michael G. Vater, ‘Introduction to F. W. J. Schelling, *Presentation of my System of Philosophy*’, in *Philosophical Forum* 32.4 (2001), p. 339. [↑](#footnote-ref-6)
7. Anton Braekman, ‘From the Work of Art to Absolute Reason: Schelling’s Journey toward Absolute Idealism’, in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2004), p. 551. [↑](#footnote-ref-7)
8. 以下简称《初稿》。 [↑](#footnote-ref-8)
9. 以下分别简称《演绎》和《概念》。 [↑](#footnote-ref-9)
10. Benjamin Berger and Daniel Whistler, The Schelling– Eschenmayer Controversy 1801,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20, p. 7. [↑](#footnote-ref-10)
11. Dalia Nassar, *The Romantic Absolute: Being and Knowing in Early German Romantic Philosophy, 1794–1804*,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p. 213-4. [↑](#footnote-ref-11)
12. 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页。 [↑](#footnote-ref-12)
13. 同上，第4页。 [↑](#footnote-ref-13)
14. Schelling, *On the True Concept of Philosophy of Nature and the Correct Way of Solving its Problems,* Benjamin Berger and Daniel Whistler(trans), in *Controversy*, p. 54. [↑](#footnote-ref-14)
15. Iain Hamilton Grant, *Philosophies of Nature after Schelling,* Continuum, 2006, pp. 3, 5. [↑](#footnote-ref-15)
16. Frederick C. Beiser, *German Idealism: The Struggles against Subjectivism, 1791–180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51. [↑](#footnote-ref-16)
17. 与Beiser认为谢林是在与费希特为代表的主观主义的斗争（struggle）中逐渐转向自然哲学的立场（“自然哲学以知识学的仆人开始，但以其主人告终。”Beiser, *German Idealism*, 483-490）不同，Grant认为，从来不存在所谓的斗争（struggle），毋宁是过度的“客观性”。Grant, ‘Philosophy become Genetic’, *The New Schelling*, Bloomsbury Academic, 2004, p.132. [↑](#footnote-ref-17)
18. 翟灿：《艺术与神话：谢林的两大艺术哲学切入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footnote-ref-18)
19. Varer揭示了《阐述》面临的双重挑战：一方面的挑战来自费希特（见于费希特与谢林的书信往来（1800-1802）），即自然哲学在知识学的先验传统中的位置；另一方面的挑战来自埃申迈耶尔（见于埃申迈耶尔1800年公开发表的《自发性=形而上学》），即自然哲学是否具有独立性（是否需要建立在知识学体系之上）。Michael G. Vater, *Rupture,* p. 135. [↑](#footnote-ref-19)
20. Benjamin Berger and Daniel Whistler, Controvers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20, p. vii. [↑](#footnote-ref-20)
21. 对这一阶段的部分研究，可参见先刚：《哲学与宗教的永恒同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footnote-ref-21)
22. Jean-François Marquet, *Liberté et existence: Étude sur la formation de la philosophie de Schelling*, Gallimard, 1973, p. 110. [↑](#footnote-ref-22)
23. 此前关于谢林1801年哲学立场的研究几乎绕不开德国唯心论内部的发展（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歌德的自然科学理论、斯宾诺莎、柏拉图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等等。我们当然不希望贬低它们在形成谢林哲学中的作用，但总的来说，我们回到埃申迈耶尔的一大原因是，谢林在1797-1801年立场的形成直接来自于与埃申迈耶尔的对话，并且1801年《阐述》的核心概念也很多取自于埃申迈耶尔。 [↑](#footnote-ref-23)
24. 典型体现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所谓“单调的形式主义”，“绝对者是一个黑夜，在其中……所有母牛都是黑的”，“绝不是一种亢奋的心灵，像子弹出膛那样，直接以一种绝对的知识为开端”，“人们并且把这种外在的、空洞的公式运用称作建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页，18页，32页。 [↑](#footnote-ref-24)
25.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7-480页。 [↑](#footnote-ref-25)
26. 以下简称《原理》。 [↑](#footnote-ref-26)
27. 我们在此有必要提及一段Potenz概念翻译史的公案。对于Potenz的翻译一直以来有“幂次”“因次”“级次”和“力量”“潜能”两类主流选择，赵鹏与赵俊杰在《世界哲学》各自对谢林早期哲学的Potenz概念进行了探讨，前者从词源学的角度倾向于“潜能”，后者则从文本的角度倾向于“幂次”。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将会显示，谢林非常明显地受到了埃申迈耶尔的影响，因此，至少在谢林早期阶段（1797-1801年），Potenz更合适的翻译应该是“阶次”，同时考虑到谢林的几何表达形式，“幂次”、“因次”等等都是可取的。此外，先刚主编的中文版《谢林著作集》将其一概翻译成“潜能阶次”，这种折中，是值得商榷的。以下的讨论中，在不影响文义的前提下Potenz不作翻译，以免引起歧义。 [↑](#footnote-ref-27)
28. 以下简称《理念》。 [↑](#footnote-ref-28)
29. 应该指出，很大程度上谢林在此受到了费希特的影响，本文不作讨论。 [↑](#footnote-ref-29)
30. Potenz概念的第一次哲学运用出现同样于此。 [↑](#footnote-ref-30)
31. Schelling, *First Outline of a System of Philosophy of Nature*, Keith R. Peterson(trans), SUNY Press, 2004, p. 22. [↑](#footnote-ref-31)
32. 我们在下面会详细解释这一点，在此不做展开。 [↑](#footnote-ref-32)
33. 谢林用斯宾诺莎的术语natura naturans加以说明，即能生的自然。 [↑](#footnote-ref-33)
34. 同上，natura naturata，即被生的自然。 [↑](#footnote-ref-34)
35. Schelling, *First Outline*, Peterson(trans), p. 189. [↑](#footnote-ref-35)
36. Ibid, p. 24. [↑](#footnote-ref-36)
37. Schelling, *On the True Concept,* Benjamin Berger and Daniel Whistler(trans), in *Controversy*, p. 55–6. [↑](#footnote-ref-37)
38. Eschenmayer, *Spontaneity = World Soul*, Benjamin Berger and Daniel Whistler(trans), in *Controversy*, p. 22 [↑](#footnote-ref-38)
39. Schelling, *First Outline*, Peterson(trans), p. 179. [↑](#footnote-ref-39)
40. Schelling, *On the True Concept,* Benjamin Berger and Daniel Whistler(trans), in *Controversy*, p. 56. [↑](#footnote-ref-40)
41. Schelling, *Ideas for a Philosophy of Nature,* Errol E. Harris and Peter Heath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37. [↑](#footnote-ref-41)
42. Schelling, *Ideas for a Philosophy of Nature,* Errol E. Harris and Peter Heath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2. [↑](#footnote-ref-42)
43. Schelling, *First Outline*, Peterson(trans), p. 17. [↑](#footnote-ref-43)
44. Eschenmayer, *Spontaneity = World Soul*, Benjamin Berger and Daniel Whistler(trans), in *Controversy*, p. 22. [↑](#footnote-ref-44)
45. Ibid. p. 18. [↑](#footnote-ref-45)
46. 参见Jäsche Logic以及Blomberg Logic, Kant, *Lectures on Logic*, ed. and trans. J. Michael You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footnote-ref-46)
47. Benjamin Berger and Daniel Whistler, Controvers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20, pp. 166-70. [↑](#footnote-ref-47)
48. 由于谢林专门为“建构”的方法论撰写了《论哲学中的建构》（1803）（SW 5,125-151），并且“建构”一直是康德-费希特-谢林方法论讨论的核心范畴，因此在谢林的“同一性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仅仅隐含在《阐述》的开篇以及不为人所重视的《概念》中的“抽象”方法论，鲜有人问津，尤其是在黑格尔主义一直对谢林的方法论进行批判的形势下。对于谢林“建构”方法论的研究，可参考Daniel Breazeale, ‘“Exhibiting the particular in the universal”: 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 and Intuition in Schelling’s Philosophy of Identity (1801–1804)’. In Lara Ostaric(ed.), *Interpreting Schelling: Critical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91–119. [↑](#footnote-ref-48)
49. Fichte, ‘An Attempt at a New Presentation of the *Wissenschaftslehre*’, In *Introductions to the Wissenschaftslehre and Other Writings*, ed. and trans. Daniel Breazeale, Hackett, 1994, p. 39. [↑](#footnote-ref-49)
50. Fichte, *Early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 and trans. Daniel Breazeal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04. [↑](#footnote-ref-50)
51. Schelling, *On the True Concept*, Judith Kahl and Daniel Whistler(trans.) in *Controversy*, p. 46. [↑](#footnote-ref-51)
52. Ibid, p. 49. [↑](#footnote-ref-52)
53. Ibid, p. 49. [↑](#footnote-ref-53)
54. Ibid, p, 49. [↑](#footnote-ref-54)
55. Schelling, *On the True Concept*, Judith Kahl and Daniel Whistler(trans.) in *Controversy*, p. 49. [↑](#footnote-ref-55)
56. Ibid, p, 49. [↑](#footnote-ref-56)
57. Schelling, *On the True Concept*, Judith Kahl and Daniel Whistler(trans.) in *Controversy*, p. 50. [↑](#footnote-ref-57)
58. Ibid, p. 53. [↑](#footnote-ref-58)
59. 谢林对沉浸式抽象的呼吁——作为区别于费希特的方法论——最近受到了批评。福斯特（Eckhart Förster）针对谢林对于费希特“先抽象，后建构”的方法论的错误挪用提出了批判。参见Eckhart Förster, *The Twenty-Five Years of Philosophy: A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trans. Brady Bowm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45-152. [↑](#footnote-ref-59)
60. Schelling, *Presentation*, Michael G. Vater (trans.), in *Rupture*, p. 145-6. [↑](#footnote-ref-60)
61. HKA,1/10,75. [↑](#footnote-ref-61)
62. Bernhard Rang, *Identität und Indifferenz: Eine Untersuchung zu Schellings Identitätsphilosophie,* Klostermann, 2000, p. 150. [↑](#footnote-ref-62)
63. 仅举几例。谢林《艺术哲学》英译版作者斯托特（D. W. Stott）将其追溯至新柏拉图主义的起源，即经由布鲁诺转介的尼古拉·库萨的术语potentia，而保罗·雷丁（Paul Redding）指出，这一术语的脉络是从普罗提诺的hypostases到库萨的possest，然后经由布鲁诺的转介，而瓦特（M. G. Vater）则将其与斯宾诺莎的conatus相比较。 [↑](#footnote-ref-63)
64. 谢林称之为“构造的直线”（constructed line）。 [↑](#footnote-ref-64)
65. 埃申迈耶尔写道：“我承认，与费希特一样，将A=B假定为原初的对立，并且——根据形式——作为无条件，就像A=A那样。”*Eschenmayer and Schelling Correspondence*, Judith Kahl and Daniel Whistler(trans.) in *Controversy*, p. 193. [↑](#footnote-ref-65)
66. Schelling, *On the True Concept*, Judith Kahl and Daniel Whistler(trans.) in *Controversy*, p. 61. [↑](#footnote-ref-66)
67. Sven Jürgensen因此将《概念》视为谢林同一性思想的“转折点”。‘Schellings logisches Prinzip: Die Unterschied in der Identität’, in Christoph Asmuth et al. (eds), *Schelling: Zwischen Fichte und Hegel*, Rodopi, 2000, p. 115. [↑](#footnote-ref-67)
68. Schelling, *On the True Concept*, Judith Kahl and Daniel Whistler(trans.) in *Controversy*, p. 50. [↑](#footnote-ref-68)
69. Schelling, *Presentation*, Michael G. Vater (trans.), in *Rupture*, p. 151. [↑](#footnote-ref-69)
70. 这种“三重性”使得不少研究者将其追溯至“三位一体”理论，我们在此不多赘述。 [↑](#footnote-ref-70)
71. W. C. Zimmerli, ‘Potenzlehre versus Logik der Naturphilosophie’. In R. P. Horstmann and M. J. Petry (eds), *Hegels Philosophie der Natur: Beziehungen zwischen empirischer und spekulativer Naturerkenntnis*, Klett, 1986. 309–29. [↑](#footnote-ref-71)
72. 以下简称《差别》。 [↑](#footnote-ref-72)
73. Philip Schwab, ‘A = A. Zur identitätslogischen Systemgrundlegung bei Fichte, Schelling und Hegel’, in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German Idealism* 12 (2017), p. 263. 施瓦布区分了早期德国唯心论围绕着同一性法则的两场争论：费希特与谢林在1799-1800关于命题I=I是否为A=A的有效性提供了先验保证的争论（即先验唯心论是否优先于其他哲学追求）；谢林与黑格尔1801年之间关于同一与差异关系的争论。我们在前文以及处理了第一次争论，当然是以埃申迈耶尔作为费希特的代言人。 [↑](#footnote-ref-73)
74. 黑格尔：《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宋祖良、程志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68，70页。 [↑](#footnote-ref-74)
75. 同上，第24页。 [↑](#footnote-ref-75)
76. Klaus Düsing, *Schellings und Hegels erste absolute Metaphysik (1801–2),* Dinter, 1988, pp. 145–6. [↑](#footnote-ref-76)
77. Manfred Frank, ‘“Identity of identity and non-identity”: Schelling’s Path to the “absolute system of identity”’, in Lara Ostaric (ed.), *Interpreting Schelling: Critical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20–1. [↑](#footnote-ref-77)
78. J. G. Fichte, *On the Presentation of Schelling’s System of Identity*, Michael G. Vater (trans.), in *Rupture*, p. 122. [↑](#footnote-ref-78)
79. Nassar, *The Romantic Absolute*, pp. 238–9. [↑](#footnote-ref-79)
80. Eschenmayer and Schelling, *Correspondence*, Judith Kahl and Daniel Whistler(trans.) in *Controversy*, pp. 192-6. [↑](#footnote-ref-80)
81. Michael G. Vater and David W. Wood, Editors’ Comments to *Rupture*, p. 137 [↑](#footnote-ref-81)
82. 谢林：《哲学与宗教》，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footnote-ref-82)
8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footnote-ref-83)
84. 对于“黑夜观牛”的系列讨论，参见Harris, Giovanni, Vater, *Dialogue: Canadian Philosophical Review* 26.4 (1987): 627–64.三位黑格尔研究专家对这句话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 [↑](#footnote-ref-84)
85. Jacobi, *The Ma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eorge di Giovanni,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88-9. [↑](#footnote-ref-85)
86. 谢林：《哲学导论》，载于《哲学与宗教》，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4页. [↑](#footnote-ref-86)
87. 因此，“一”既是绝对超越存在者之上，又是作为一切存在者整体的“全”，没有超越性的“一”，“全”就会落入恶无限，而不能作为得到了完成的、有其边界的整体；“一”如果不以“全”来映现自己，那它就是一个空的东西。参见王丁：《本原的二重性与统一——论谢林最终的哲学方案》，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4期，第13-20页. [↑](#footnote-ref-87)
88. 谢林：《哲学与宗教》，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2页. [↑](#footnote-ref-88)
89.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3页，95页. [↑](#footnote-ref-89)
90. 谢林：《学术研究方法论》，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55-9页. [↑](#footnote-ref-90)